

文章编号:1674-8107(2019)02-104-06

# 作为意识形态和作为心灵形式的朦胧诗

胡书庆

(郑州大学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 朦胧诗具有文学与文化的双重身份:它既是传统政治性书写的最后一种形态,也是当代个体生命书写的初始形态。朦胧诗的政治性主要体现在对时代政治气氛的反抗意识的表达上。而其真正而唯一的根源则在于心灵。它所表征的就是心灵与自由二者特殊的共在关系。总之,它是一代人的足够真诚的心灵形式。

**关键词:** 朦胧诗;意识形态素;心灵形式

**中图分类号:** I207.25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issn.1674-8107.2019.02.016

新时期诗风的演变之快似乎有点出人意料。就在诗坛关于朦胧诗的历史及情感的合法性的论争尚未真正尘埃落定之际,一股更大的新诗潮——第三代诗歌运动——就汹涌而来。这场叛乱虽然远不像朦胧诗最初的自我生态那样隐忍而漫长,但实际上也是蓄谋已久的。超越朦胧诗可以说是第三代诗人的共识。究竟为什么朦胧诗会招致第三代诗歌的大规模声讨和叛离,这实乃一个具有重要思想史意义的课题,而远非一个单纯形式主义方面的问题。质言之,第三代诗歌运动彰显了一代青年真正的现代自我意识的觉醒。其中的“人”,才真正抵近了现代哲学意义上的主体。而朦胧诗的主体,与百年新诗的主体一样,仍主要是一种政治主体,而非一种存在主体。第三代诗歌反朦胧诗所反的,就是在其中仍起着实质性作用的政治巨灵。然而,在形式要素上,甚至抒情主体的个体本位主义立场上,第三代诗歌又基本上是承朦胧诗的脉索而来的。不承认这一点是一种有意而浅薄的狂妄自大的表现。其实,你怎么估量朦胧诗对于那个年代写诗的青年的影响,可能都不过分。时至今日,我们只要去聆听新时期的诗歌,就会径

直转身看向那一批朦胧诗人。笔者倾向于认为,朦胧诗具有一种双重的文学与文化身份:它既是传统政治抒情诗的最后一种形态,也是当代个体生命书写的初始形态。那么,朦胧诗究竟在何种意义上仍是政治性的诗歌存在呢?它为什么又已经全然抵近一种现代心灵形式了呢?

—

朦胧诗的根本主题之一就是反抗。反抗的指向乃时代政治气氛对本真人性的窒息。朦胧诗的政治性体现,或者说其“意识形态素”(詹姆逊语),即对时代政治气氛的反抗意识的表达。所有的政治背后隐藏的都是奴役与反抗的故事。艺术的政治性背后隐藏的,其实也是同样的故事。艺术主体折射的是现实中的主体。而现实中的主体,其身份只是一个被建构、被形塑的结果。来自政府、社会、环境等方方面面的力量的作用,或者对那些作用进行抵抗的反作用,使主体的身份始终处于一种不确定性中。只是,它所折射的是精神奴役和精神反抗的故事。诗歌的政治经验归根结底不是政治的经验,而是诗歌自身的经验;它与时代政治的关

收稿日期:2018-09-12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论中国当代先锋诗的谱系研究”(项目编号:16BZW143)。

作者简介:胡书庆(1968-),男,河南开封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和西方诗学研究。

联方式并非政治的方式,而是其自身的方式。不同于真正的政治主体那种实为一种特殊的主体间性的主体,在作为一种经验事实的艺术存在中,只有一个唯一的主体,即作为时代精神状况的感受者和作为自我精神自由的追求者的现代生命个体。朦胧诗真正而唯一的根源还在心灵,它所标明的就是心灵与自由二者特殊的共在关系。心灵热爱自由,而且在与世界以及自身的交道中,心灵有能力不断确立自己的伸展方向——不用说也会是一种表征了根本的爱和美的方向。诗歌事件中起决定作用的就是心灵的自由属性。当抒情诗主体能尽享自由的时候,它就歌唱那自由的体验,歌唱在那自由体验中无尽生长的美好的关联;而当心灵无法拥有自由感的时候,它便抒发自己的郁闷,对自由不屈的渴望及对异化它的外在因素的反抗意识。诗歌的最大秘密就是抒情诗主体的内在生命自由抒发自由表现的秘密。这个秘密,即便面对包括政治在内的各种异化因素,也会退守到一种隐秘的自我时空中坚决地敞开自己。

关于朦胧诗潮的政治因素,老一代文学批评家刘登翰作过如下实实在在的描述:“如果追溯一下这群年轻诗人走向文学的历程便可发现,恰是耽误了这一代人青春的十年浩劫,造就了这一代人的歌手。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都成长在‘文化革命’这波滔云诡的动荡的10年间。历史的曲折发展使他们普遍地都经历了从狂热的迷信到痛苦的觉醒,从苦闷的徘徊到真理的探求这样一个曲折而丰富的心灵历程。对10年变幻莫测的政治斗争的厌倦和反抗,使一部分不倦于思索的青年从政治转向文学。当他们发而为声,在表现自己冷静的思索时,便不能不带着这一代人的精神特征,展示出自己这个曲折的认识过程和复杂的心理变化,他们开始于‘四人帮’时期的创作,便带着对于‘四人帮’推行的那一整套极‘左’政治的强烈的叛逆情绪,追求表现自己内心的真实,表现自己这一代人产生于那个特殊年代的真切的感受和思考。”<sup>[1](P72-73)</sup>不管这一描述在多大程度上切中了历史场域的细节性的真实,但就文学场与政治的关联本身的意义上说,起码是有着理念上的正确性的。正像大多数西马思想家所认为的:压根儿就不存在自主的文学。即便你把一些东西形容为文学主题的政治污染物,这个污染物却也是难以治理

的。再激进一点看,“我们所居住的象征意义的世界是一个无外在性的和不稳定的飘浮的连续体。反对它的所有反应都必须使用它的词汇,因而也是它的一部分,并将为其所吞没。你不能真正退出。没有地方可退。你对这文化系统的抗议仍然是这系统的一部分。”<sup>[2](P10)</sup>亚里士多德曾断言:人是“政治的动物”。数千年来的全人类历史已经印证了这一点,而且这一命题适于所有人。我们至多可以说,政治对不同的人作用的方式及程度是有差异的。譬如,时代政治对“归来的诗人”与对朦胧诗人的作用就不一样,其所引发的精神反应从而也呈现出不一样的形态。但如果说朦胧诗是一种远离政治的纯粹艺术生态的表现,这就意味着犯了某种幼稚的艺术癔症。

不过,如果简单地认为,经由“文革”共同进入新时期的两代人,其诗歌均表现出了很强的政治性,很多作品属于广义上的政治书写,很多作品的政治性远远大于艺术性,这对朦胧诗来说还是有失偏颇的。实际上,从内容到形式,朦胧诗都意味着一种全新的诗歌形态的诞生。要把这一点说清,需要我们以充分辩证的眼光去分析。

## 一

不妨还是先对朦胧诗进行一番具体的政治寻绎吧。先从朦胧诗的先驱式人物食指谈起。食指活跃于“文革”前,是“太阳纵队”的边缘成员。1968年,“太阳纵队”这一不存在的组织的“领袖”张郎郎被通缉,“与朋友们匆匆分手之际,在送给王东白的本子的扉页上写下:相信未来。”<sup>[3](P115)</sup>食指就以这一留言为题,写下了那首以手抄本形式在知青中广为流传的诗作——《相信未来》。

关于《相信未来》的美学特征,我们已不必多说。单说诗之言说纯美如《相信未来》者是怎样与时代政治联系到一起了呢?显然,呈现在这首诗中的抒情主体,分明仍是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气候所塑造的大写的政治理性主体。它并不完全指向个体性的存在主义意味的精神和心灵。它仍是那种集体本位主义的、符号性的、作为“一代人”的代言人。这里面有对青春生命的无言的热爱,也有传统的集体乃至家国观念在一代人意识阵地同样悠久的统领地位。这是一种悠久的、历史的和心理的积淀,经常在一定的历史场域以一种集体无意识

在发挥作用。

“一代人”，是那个年代从政治主体到文学主体特有而凸显的身份记忆，并对应着某种话语上的普遍性。那一代的文学叙述的“主词”基本上都是“我们”而非“我”。在那个特定的历史场域及相应的文学表现场域，作为“一代人”的代言人的抒情主体，总是带着那一代青年特有的迷惘和惆怅以及某种特有的光亮。或者说，在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土壤，既渗进了一种悲剧意识，也强韧地生长着某种乐观诉求。顾城在《一代人》中写道：“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张承志在《北方的河》弁言中也有与《相信未来》异曲同声般的宣叙：“我相信，会有一个公正而深刻的认识来为我们总结的：那时，我们这一代独有的奋斗、思索、烙印和选择才会显露出意义。但那时我们也将为自己曾有的幼稚、错误和局限而后悔，更会感慨自己无法重新生活。这是一种深刻的悲观的基础。但是，对于一个幅员辽阔又历史悠久的国度来说，前途最终是光明的。因为这个母体里会有一种血统，一种水土，一种创造的力量使活泼健壮的新生婴儿降生于世，病态转弱的呻吟将在他们的欢声叫喊中被淹没。从这种观点看来，一切又应当是乐观的。”舒婷的《献给我的同代人》则写道：“……唯因不被承认/才格外勇敢真诚/即使像眼泪一样跌碎/敏感的大地/处处都有/持久而悠远的回声//为开拓心灵的处女地/走入禁区，也许——/就在那里牺牲/留下歪歪斜斜的脚印/给后来者/签署通行证”。舒婷的名作之一《祖国啊，亲爱的祖国》，虽然从文本形式上看，这里的抒情主体是“我”，但这个“我”，显然也是作为“一代人”的代言人而被定制身份的。我们说，这些文本中所融入的情绪记忆、心理经验和精神体验，既是青春生命天然的精神属性，也是某种历史的赋予。这些陈述好像折射着这样一个基本态度：把“他者”看待自己这代人的眼光，把后世对这代人的评定，放在了一个至高的位置，反而把自我理解、自我认识放在了一个较次要的位置。

食指之所以唱出对未来的坚强信念，其根底并不在于源于个体灵魂深处的力量，而在于同样源于时代政治土壤的一种想象。他有时也会使自己的诗思之翅止憩于自己最内在的自我体验，唱出个人的迷惘与哀戚，但他往往又会一骨碌醒来，

唱响时代的主旋律。想必很多眼光都会在食指身上观感到这样一个令人有点忍俊不禁的事实：食指在精神失常的边界状态写出来的诗（据多多的有关回忆，至少在1974年冬的时候，食指就已经精神崩溃），大多写出了自己的灵魂；而在清醒的状态下的创作，则更多地扮演了“时代精神单纯的传声筒”。这似乎佐证了某个心理学观点：人在精神失常的边界状态（当然，在这一问题界面，你也可以捍卫法国哲学家德勒兹的观点：人们通常认为精神不正常的人，恰恰是最正常的），才更能打碎自己的外在人格面具，触及到自己赤裸裸的自我，并进而去表象这个自我；而当人的精神完全“正常”的时候，反会因“理性的狡黠”（黑格尔语）而走离本真的自我。因为这个“正常”的个体，会受到来自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表意体系的塑造，会成为“意识形态作用下的一个虚构的原子”（福柯语）。

在食指写于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的诗作中，祖国、河山、太阳、光辉、红旗、劳动等等字眼，可谓俯拾即是。这些措辞都是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的。写于1970年3月的《我们这一代》一诗，不啻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农村“十·一”抒情》《南京长江大桥》《新兵》等数量相当庞大的作品，则是站在时代意识形态之巅，对“工农兵”的一颗颗红心进行了热情讴歌。其实，与“太阳纵队”的其他成员相比，食指的诗歌在创作精神上反而有着更明显的政治意识。那些成员有的反而更像是文学圣徒。一如张郎郎所陈：“那会儿，我们爱诗、爱艺术到了半疯状态。那会儿，真是没想到政治的阴影将会多么沉重。我们又不想当官儿，政治和诗有什么干系？”<sup>[3](P105)</sup>他们对社会的唯一要求是，“别人别干涉我们的文学游戏就行了”。食指的《相信未来》等诗之所以能在知青中广为流传，盖因广大知青们除了对青春生命无言的热爱外，还有着同样的领袖崇拜意识和政治热情。

北岛之让人们记住他，首先就在于那首人人耳熟能详的《回答》（发表于1978年12月23日的《今天》创刊号）。如要考察北岛的诗思起源的话，政治情态的确是呼之欲出。《回答》既是一则政治寓言，也是“一代人”心声式的宣言。

北岛曾说他正是看了食指的《相信未来》以后决定写诗的。从这首诗的体式、旋律与节奏诸要素

上不难看见《相信未来》的影子。最实质的表现还在于,它在精神格调和理念内涵上,与《相信未来》如出一辙。都是集体意识、“人类”意识、广场情怀、“一代人”精神的投射。这种诗看似激情澎湃、气势昂扬,其实这里面抒发的是一种干燥的激情,有一种内在空洞性。它有着丰富的文化符号,却又有其特有的不及物性。这种不及物性完全不同于某些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文学书写的不及物性。在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式的文学书写中,那种不及物性完全表现为语言自身的裂变行为,它“卸掉了所有本体论的重量”,它在自己内部,“发现有可能会自我分裂和重复,并有能力生发出一套镜子、自身影像”<sup>[4](P11)</sup>。那是一些特殊的文学自己的时刻,是一种基于知性敏感的过度的想象力之游戏。而现在这种不及物性则在于,虽然主体在它的诗歌话语场是绝对在场的,但它所塑造的,却是一种抽象的、内在空洞的、没有具体所指的主体,一种实由时代意识形态语境塑造的符号性主体,一种大写的“理念人”。这里面的主题场景随意跳跃,它们之间毫无逻辑关联。我们从中感知到的,只是一种观念性的东西,甚至一种口号性的东西。它并不能带给我们震动,更不会带给我们感动。为什么?因为这每一重宣泄性的场景,其实并没有真正富于质感的微观层次的经验事实的支撑。

然而,一个巨大的精神现象学事实是,正是像食指《相信未来》、北岛的《回答》这样的诗作,引起了一代青年极大的共鸣。一方面,这源于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关于一种公共身份的想象。其实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人才是“政治的动物”,而其活动也才是广场性的。就这一点而言,人类历史上的任何运动,当然也包括文学运动,概莫能外。真正的艺术生态,永远都是个体性的,属于个体与其最内在的自我为伴的结果。而凡是集体性的作派,都是有着政治性的因子弥漫其间的。就《相信未来》《回答》等篇章所放射的思想和精神气质而言,它们之所以能在一代青年的心中激起那么大的共鸣,或许印证了这样一个看法:“只要自由思想是个人对教条的冷嘲热讽的对抗,只要它仅仅是否定的破坏的,它就永远不会变成一种伟大的、活生生的力量。为了如此做,它必须在确信它自己的绝对正确性方面变得强有力,富有创造性,对过去怀有同情心,对未来感到自信,尤其是充满热

情。”<sup>[5](P17)</sup>这些就其自身的意义上说,都有着某种坚韧的历史合法性,构成它的全体因素都处在一个互相关联着的统一场中。或可采用这样的哲学观念来支撑这一话题界面的陈述:世界就是“在逻辑空间中的事实”,而“逻辑中没有偶然的東西”<sup>[6](P22)</sup>。这种“逻辑”性,其实就是事件之所以生成的各种因素的内在相关性。

### 三

不过,笔者认为,朦胧诗也是一代人的足够真诚的心灵形式;或者说,朦胧诗已经在向现代心灵形式大幅抵近。之所以给出这样的描画,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指标:一是这里的抒情主体已是充分觉醒了的现代生命个体,诗中的经验表达深深打上了个体性的烙印。固然,朦胧诗与“归来的诗”一样,都有意识形态素的在场,但两者之间其实还是有着质的区别。或可以说,“归来的诗”是在以某种集体的视角看社会看文明,朦胧诗是在以个体的视角看世界。二是它在表现形式上已完全感领了作为现代心灵的表征形式的现代主义诗歌的秘笈。如果我们也足够真诚的话,我们自会承认,朦胧诗的存在,业已让我们目击到现代主义诗歌的精纯艺术质地。

我们先说第一个层面。从理念内涵上考量,朦胧诗所折射的是一则解放的故事。这里固然有着社会的解放、政治的解放,但更有着本真人性的解放。“人的启蒙,人的觉醒,人道主义,人性复归……都围绕着感性血肉的个体,从作为理性异化的神的践踏蹂躏下要求解放出来的主题旋转。‘人啊,人’的呐喊遍及了各个领域、各个方面。”<sup>[7](P270)</sup>这一切归根结底意味着“人的觉醒”。而“人的觉醒”,在一代青年人那里,则主要意味着生命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心灵的苏醒。于是,他们一方面步入控诉、批判、反思的大潮,汇入一代人共同的心声表达,另一方面返回自己内在的心灵自我,表达自己真诚思想和情感。就朦胧诗人而言,“诗人主体意识的恢复,使诗人对世界和心灵的思考具有了独立的性质。诗人不再盲从,他敢于说出他所看到的世界的真相或投影。”<sup>[8](P167)</sup>朦胧诗人们虽然也表达了庞大的时代性主题,但这种表达与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政治抒情诗对现实的关注方式之间,是全然两样的。质言之,朦胧诗对现实的关

注采取的是个体性的视角,表达出来的东西都经过了抒情主体内心的过滤,而不是虚伪空洞的政治文化符号的假借诗歌的转换。

再者,个体性的视角,必然会使得诗歌行动有一种“当下即是”的经验事实的基本面向。诗歌所表达的内容,作为一种经验事实,它是转瞬即逝的。只有萦绕着瞬间经验的表达,才能把最纯粹的诗意——不计利害的静观及最为真纯的思想和情感——表达出来。我们说,这才是回到诗歌本身,才是真正的诗性的还原,也才是出自古老人类心底的那“唯一的古老的诗歌”在特定时代的咏唱。

心灵的天性是对自由生命的热爱和对美好事物的感知。而这些反应并不或者说主要地不受制于外在因素。它们更出于个体性的精神和心灵体验的活源。心灵自会寻找并确立它认为正确的发展方向,但这一切的前提是个体性的精神自由。当这个自由不成立了,它就会处于一种自我压抑的状态;而当自由有保证了,它便会抑制不住它那自我尽情抒发的天性。从一定意义上说,朦胧诗现象,就折射了这样的心灵与历史之间的辩证法。一如《今天》发刊词中所言:“历史终于给了我们机会,使我们这代人能够把埋藏在心中十年之久的歌放声唱出来,而不致再遭到雷霆的处罚。我们不能再等待了,等待就是倒退,因为历史已经前进了。”虽然,这一宣言尚带有那个特定时代所烙下的某些印痕,还隐隐伴有心灵在政治意识形态的阴影下的恐惧和颤栗,但它已经在以一种内在的方式触及心灵的属性,已经在带着被本真的诗与思所感动的神秘返回歌唱的始基。其实,要论对纯诗主义和唯美主义的诉求和捍卫,统观新时期以来各个阶段的新诗表现,真还没有能超出朦胧诗的。我们不妨简单抚触一下读者群最多的几位诗人的诗歌。

北岛在骨子里实乃一诗歌圣徒。他最本色的诗歌不是《回答》之类,而是超政治、超历史、超文化的唯美的心灵歌唱。的确,《回答》表达了一代受历史蒙骗的青年的觉醒、激愤及重新奋起、勇于担当的意志和力量,是应历史情势而生的“广场诗歌”。他也因此名扬天下。但在更内在的个人生命感觉的意义上,面对未来,诗人则如是歌道:“走吧,落叶吹进深谷,歌声却没有归宿。//走吧,冰

上的月光,已从河床上溢出。//走吧,眼睛望着同一块天空,心敲击着暮色的鼓。//走吧,我们没有失去记忆,我们去寻找生命的湖。//走吧,路呵路,飘满了红罂粟。”(《走吧——给L》)北岛诗歌最重要的意义恰在于,它们以生命本位主义的立场及简洁、唯美的意象和形式结构,在个体性和自身性的抒情场中,在中国当代诗坛较早地表征了生命的自觉和“诗的自觉”。

北岛不止一次检讨过他的《回答》之类的诗作。他不但表现出对诗歌政治色彩的反感,甚至对“诗歌背后的文化意义”也持漠视态度。他同样持守这样的现代主义诗观:诗歌是在语言中发生的事件。这个在语言中发生的事件,在北岛这里,主要表现为对意象的萃取和对语言的高度精炼要求。《易经》有言:立象以尽意。这是我们最古老的诗学观念。不成想,这一诗学观念,是在历经数千年后,到了现代主义诗歌正式登场,才被奉为圭臬。就我国的新诗发展看,虽然现代主义诗歌思潮也可谓由来已久,而且也在实践的层面表征着这一观念,但只是到了朦胧诗的时间,才被置于无可替代的地位。而对这一诗观捍卫最有力的,就是被誉为朦胧诗主将的北岛。北岛的大多数诗作,以其特有的品质表征了觉醒了现代心灵,是现代心灵形式最卓越版本之一。

舒婷的诗轻理智重感情、轻知性重直觉、轻直白重意象表达,以其对人间的爱和美的真诚与敏感表征了一种罕见的抒情深度,给人带来一种纯美的艺术享受和一种情感的至深陶冶。舒婷的诗大都体现了单纯的外观与丰富的情感层次的完美结合,而那丰富的情感层次中则渗透着细密的精神冲突因子和对自我本真生命情怀的持守。在表现形式上,舒婷同样反对直陈其事,喜欢采取暗示手法,注重用意象表达,让意象联袂而起,整体作用(这些也是法国象征主义诗派的大将马拉美的诗学主张)。总体上看,舒婷的诗表达的主题多是细腻的个人经验。

顾城更是一位真正以心灵写诗的纯粹的诗人。虽然顾城也被称为朦胧诗人,但他从未概念化地理解过所谓的朦胧诗。他表示,“寻找美并表现美”是自己唯一的目的。他要“用心中的纯银,铸一把钥匙,去开启那天国的门”(《学诗笔记》)。他的生命在自己心灵的想象或幻想中与“那天国”融为

一体。他在精神上躲进这个“天国”里,从而使他得以穿越现实生活中实存的世界,使他自己的生活得以延续。写作中,那种澄明于自然万物中的自由灵性也成了他自己的自然修辞。顾城后期的诗歌表现出另一个趋势,那就是某些阴郁情绪开始涌动,想必这与他的心灵越来越感到现实的煎迫及他的“成人理性”越来越意识到他的“乌托邦”梦想的虚幻性有关。顾城的诗歌尤其是后期诗歌,的确也让我们听到了很多“不谐和音”。但不管怎么,对那源于自然灵性和本真生命的美的理想的执著始终是顾城的内心生活中的一个最坚韧的事实。诗人依旧对这个世界有他自己全部的感知,而这感知,是独属于他自己的。

总之,朦胧诗人有着他们/她们自己独特的文

学与文化双重身份。虽然朦胧诗现象已经成为了历史,但它的双重启蒙作用会不断在新的历史场域唤起遥远的回声。从“纯诗”的角度看,也许朦胧诗的纯度还不够,但朦胧诗正是依靠了那双重维度的表现,才在一代人的时代记忆及诗歌记忆中占居了不可替代的位置。正是那“五四”意味的启蒙色彩,使它成了新时期思想解放和人性解放的先声;正因为它是发自心灵深处的觉醒,它才那么一石激起千重浪般地牵动一代人的思想和情感。从人类的诗歌存在自身的意义上说,诗歌的轰动效应或许也是某种异化表现,但这也是任何隐秘的心灵建构想要赢取其社会存在的历史身份的最初方式。

### 参 考 文 献

- [1] 吕周聚.朦胧诗历史档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2] 唐·库比特.上帝之后[M].王志成,思竹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
- [3] 张郎郎.宁静的地平线[M].北京:中华书局,2013.
- [4] 汪民安.福柯读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 [5] 卡尔·皮尔逊.自由思想的伦理[M].李醒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 [6]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M].郭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 [7]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北京:三联书店,2016.
- [8] 谢冕.谢冕编年文集:第5卷[A].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 Misty Poetry as Ideology and as Soul Form

HU Shu-qi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China)

**Abstract:** Misty poetry reflects a dual identity of literature and culture. It not only reveals the last form of traditional political writing but also initial form of modern individual writing. Misty poetry mainly reflects itself on resistance against political atmosphere of the times. The uniqueness of misty poetry resides in its deep concern with inner mind. It shows the co-existenc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ner mind and freedom. In a word, it is the soul form with sincerity of one generation.

**Key words:** misty poetry; ideology factor; soul form

(责任编辑:庄暨军)